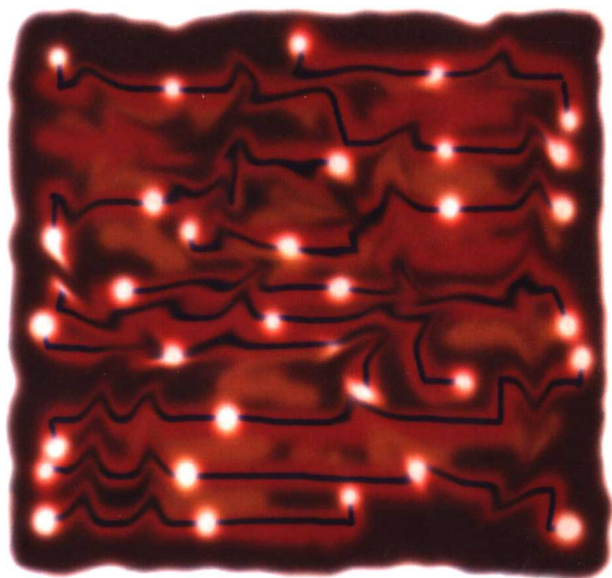


清华语言论丛

Understanding

语用学诠释 Pragmatics



耶夫·维索尔伦 著

钱冠连 霍永寿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清华语言论丛

语用学诠释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耶夫·维索尔伦 著

钱冠连 霍永寿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由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 Jef Verschueren 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钱冠连教授翻译的一本语用学领域精品著作。书中系统地将语言适应论与语用综观论搭建成一个完整而统一的语用学理论框架,其哲学底蕴深厚,并且反映出当今语用学界的新观点。不仅给读者以本学科的知识,更能带给读者以超出知识之外灵活应用的智慧。本书专业性较强,适合研究生、语言学研究人员、教学人员及相关专业本科生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用学诠释/(比)维索尔伦著;钱冠连,霍永寿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清华语言论丛)

ISBN 7-302-07149-7

I. 语… II. ①维… ②钱… ③霍… III. 语用学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6362 号

出 版 者: 清华大学出版社

<http://www.tup.com.cn>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邮 编: 100084

客户服务: 010-62776969

责任编辑: 朱瑞党

封面设计: 常雪影

版式设计: 肖 米

印 刷 者: 世界知识印刷厂

装 订 者: 北京国马印刷厂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148×210 印张: 11.75 字数: 323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2-07149-7/H·528

印 数: 1~3000

定 价: 22.00 元

语用学的大格局——译者序

在《语用学诠释》(*Understanding Pragmatics*)出世之前,仅以理论框架而论,在国际语用学占统治地位的是英美语用学的一套**基本分析单元说**。这个学说所主张的是,语用学有一些基本的分析单元——如指示现象、含意、预设、言语行为、会话,诸如此类的语用现象供人讨论与分析。这些分析单元中,“言语行为理论所施加的影响至今仍未消失。该理论曾经是英美语用学突出地位的驱动力。”(见本书第 9.1 节)这一派理论框架的构建者,主要为 Levinson, Austin, Grice。

在耶夫的语言适应论与语用综观论诞生(这两个术语出现已有十几年)之后,尤其是《语用学诠释》(系统地将语言适应论与语用综观论搭建成一个完整而统一的语用学理论框架)正式出世之后,国际语用学理论的格局就有了重大的变化。什么变化呢?

耶夫在本书中从头至尾反对“基本分析单元说”。他认为,语用学不仅不能和语音学、音位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这个对比集相并列,也不属于神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这类跨学科领域。这个领域中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与语言研究联系的相关对象。但是,不可能给语用学指派一个基本的分析单元,也不可能鉴别出一个具体的相关对象。语用学涉及到的是语言性行为的全部复杂现象。他的这一立场是很彻底的。

代替基本分析单元的东西是:“语言性行为的全部复杂现象。”(见本书第 0.3 节)所以,他给语用学的描写性定义是:

我们可将语用学具体化为一种从认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

MAH 21/15

整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而这种综观与人类诸种行为中的语言现象的使用相关^①

我们可以把这一理论称为“综观论”。于是,耶夫以自己的“综观论”与英美的“基本分析单元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在国际语用学理论的格局中,产生了欧陆型的“综观论”与英美型的“基本分析单元说”的对垒。这是语用学的幸运。在任何一个学术界,一论横天下,总是一种不幸。学术上真正的发展离不开真正的争鸣。形成百家都行,何论两家?

我从上一个世纪的80年代末期开始介绍他的综观论。今天,我们选中他的这本以综观论为骨架的书介绍给中国读者,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我以为,他试图构建一个统一而连贯的语用学理论框架的尝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值得肯定的。这是选择此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第一个理由。理由之二是,全书哲学底蕴甚厚,除了最后一章重点回忆语用学的哲学渊源之外,在全书的叙述中,充满了哲学气味。这样两个特点,不仅给了读者本学科的知识,尤其是给了超出知识的智慧。由于篇幅限制,这两个特点就不在此展开了。

但是,我们还不能说西方世界的语用学理论是两分天下。因为,德国哲学家、思想家哈贝马斯(Habermas, J.)创建的语用学完全采取了另外一个路子:他从交际同社会进化关系的角度,形成了他所说的“普遍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s)。他强调语言交际中的语用规范,将他研究的语用学称为“规范语用学”(formal pragmatics)。尤其是他将语言运用置于超语境的人类语言交际的普遍经验之内,

① 此句原文是:... we can now further specify **pragmatics** as a general cognitive, soci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on linguistic phenomena in relation to their usage in forms of behaviour... 由于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定义,翻译时采取了相应的描述方式。如果硬要译成汉语严格的定义形式,可作如下尝试:语用学是一种与人类诸种行为中的语言现象的使用相关的、且从认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整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译者。

使语用研究成为一种理性的重建^①。“哈贝马斯的规范语用学本质上是探索一条由形式语义分析走向语用分析的道路,是理性地构造一条将语义分析与语用分析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是现实地构筑一座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融为一体的哲学大厦,是理想地修造英美经验主义与欧洲大陆理性主义传统统一途径的尝试。”^②当然,可以说这种语用学是一种哲学意味上的东西,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语用学。对交际规则深有研究的海姆斯(Dell Hymes^③)是这样评论哈贝马斯的这一工作的:交往理论的第三种倾向,是把交往概念作为社会批评性评价的一个基础。“这一倾向是哈贝马斯著作的核心。哈氏区分了交往互动(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领域与人际关系中起作用的领域,后者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相对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理想状态上看是一种可控制的关系,而人际关系是不可控制的关系。哈贝马斯发现交往互动,它预先假定了一个理想的言语情景的各种因素——在此种情景因素中,现存的社会因其交往一一被歪曲而受到批评剖析,哈氏发现这个交往互动是个预见社会前景状态的理想之物”(Habermas, 1970: 114~148^④)。Dell Hymes还说,“哈贝马斯的理论观点本身是可以批评的,他的理论表达了对知识分子未来社会的兴趣,但他的著作表明,交往理论不仅可以以科学的术语说话,还可以以人类抱负的语言说话。”我以为,我们有了这原则那准则经验性的东西(英美方面的),又有了欧洲大陆理性的东西,出现哈贝马斯的理想式的交往理论,是一种思考路线的必然发

① Habermas, J. 1987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 Vol. 1: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M] Boston: Beacon Press.

Habermas, J. 1998 *On the Pragmatics of Communication* [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② 郭贵春,哈贝马斯的规范语用学[J]. 哲学研究,2001(5)

③ Dell Hymes, 1980. Foreword to *Communication Rules: Theory and Research*, by Susan B. Shimanoff, SAGE Publications, Beverly Hills, London.

④ Habermas, Jurgen. 1970 "Toward a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pp. 114—148, in Hans Peter D. (ed.) *Resent Sociology*, No. 2: *Patterns of Communicative Behavior*. New York: Macmillan.

展。于是,哈贝马斯的理论园地,哲学家、社会学家、语用学家、人类行为学家以及社会批评者,都可进入,出来时还可以各取所需。这正是一种学术的理想境界。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语用学的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我曾在“语用学:中国的位置在哪里”(外语学刊,2001/4)中分析道,我们的理论引进有了扎扎实实的发展。但是,我国语用学学者没有产生出重大的理论创造,在学术原创性、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选题、语料运用、撰写语用学发展史这五个方面,我们尚未加入国际主流。作者在四个方面提出了推动我国语用学向前发展的建议:1. 我们明白了引进与创造的关系,就可以将力量正确分配。2. 弄清缺乏理论原创性的原因,是前进的开始。3. 硕士与博士如果能善于利用自己的理论与方法论上的势头,他们在母语学习上分出一段时间,面向现实生活与职业领域,必然会给中国语用学界带来新鲜的活力。4. 理论酝酿是要花时间的,但问题是要把酝酿的时间与精力花在(1)理论意识的确立;(2)学术视野的扩大;(3)方法论上的多样化;(4)语种选择的多样化上。

我本人在《汉语文化语用学》中,从汉语文化的根基上提出了三带一理论,或者干脆说,语用三相论:语境干涉、附着于人的符号束的参与、智力干涉。没有理由断言:因为这个理论的提出者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个理论不能成立(每一个理论之初都是不成熟的)。一个理论是否能成立,要看这一理论本身是否有活力,要看理论本身的解释力与穿透力是否强大。当然,这需要时间的考验,尤其需要被证伪、被反驳。在历史的长河面前,任何个人的奢望或者武断,都是无济于事的。

以上的思考,是受了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的启发而生。

仅以此为序。

钱冠连

2002/8/3,于羊城,冬收斋

e-mail: qiangl@gdufs.edu.cn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家文科重点基地

译文说明

1. 为何比较多地使用了译者注？

为了尽量减少汉语读者的困难，帮助理解该著作的内容。也许这样是画蛇添足。如果这些注明能稍有裨益，我们花这些精力还是值得的。

2. 为何带年号的外国人名（如 Austin, J. L. 1962）不翻译出汉语译名来？

原因有三。一、书后的参考书目是原文（英文），这个庞大的书目采用了外国人名加上年号为主的方便查找手段。这样，原封不动的外国人名加上年号，可与书后的参考书目直接对上号。若将人名翻译出来，这个方便就没有了（原来可用的资源浪费掉，实在可惜）；更坏的是，拿了汉语译名去查英文书目反而增加麻烦。二、译者认为，这样可以促进汉语读者养成以原音记忆外国人名的习惯，这样不仅比记忆汉语译名更准确，某些读者还可在将来具备了英语阅读能力以后，参考书目就起大作用了。三、新一代的汉语读者，有基本外文阅读能力（借助辞典）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3. 为何译文中（目录与正文）一切编号（见下例）、一切符号（包括黑体与种种线条）、一切字样（汉语读者熟悉的引言都用“……”，而原文用斜体的地方，我们改用了楷体，这样既有了区别特征，又考虑了方块字用斜体实在是引起汉语读者的不习惯）基本照原样排版？

这样做，一是为了方便读者与原文对照，二是为了方便编辑寻找编排的线索。如：

1 语言与语言的使用

1.1 语用学的常见论题

1.1.1 指示现象

1.1.2 言语行为

1.1.3 内隐意义

意义的完全外显性的不可能性

传达内隐意义的规约手段

外显性的策略性避免

1.1.4 会话

原文中没有,而译者认为应该加进去的部分,用[……]以兹区别。请读者诸君注意。

4. 为什么增加了一个简明的汉英对照的关键词表? 根据什么原则选择出了这样的一个关键词表?

原书后面有一个索引,包括了很多语言学甚至其他学科的术语,反而将本书独创的术语淹没了。我们以为对原书是一个损失。所以我们增加了一个简明的汉英对照的关键词表(还分了两个级别),所有作者独创的术语全罗其中。而且,在正文中,凡是重要的语用学术语,尤其是本书独创的术语,我们已经随文附上了英文,以便读者进行对照。

选择出这样的一个关键词表的根据是:第一,作者自己在第二章中宣称全书的关键概念有四个(做出选择、变异性、协商性、适应性),研究角度有四个(适应性的语境相关成分、适应性结构对象、适应性动态过程、适应过程的意识突显性),然后,我们根据全书的宗旨,再加上了两个(语言适应理论、语用综观),总共十个,冠之以“第一级”。我们认为这十个关键词是全书的精华。

第二级的关键词是从全书目录中选择出来的,舍掉的词是一般语言学和别的学科共用的术语。

我们认为,这二级关键词语足够显示全书的精华。

5. 最后一个问题涉及到翻译理论,虽然肯定有争论,但我们还是愿意交待如下:本书的翻译原则是什么?

忠实。我们认为,没有哪一个翻译原则比忠实原文更重要,更具有根本性。拿一个最小的例子说,原文是双重否定句,我们不译成肯定句,因为双重否定毕竟与直接肯定是不同的。强调忠实于原文,并非主张死板,主张“克隆”,如 ill-informed people 我们也愿意译成“孤陋寡闻的人”而未译成“消息不灵通的人”,适当照顾那些喜欢汉语四字成语的读者的口味。

最后,钱冠连需要说明的是:我的博士生霍永寿译头一遍,由我一句一句校改,并统一定下术语的翻译(这恐怕是学术著作最难、最值得重视的一件工作)。如 implicit/implicitness 与 explicit/explicitness 同时出现在一句或一个自然段落时,译为“内隐的”或“内隐性”与“外显的”或“外显性”以突出它们的对比性;当这两对词分开单独出现并未形成对比时,就可以根据不同的语境选择译文(如“隐含的”与“明显的”等等)。又如,为什么将 a theory of linguistic adaptability 译成“语言适应论”,而不取“顺应论”,我们在译者注中做了详细的交待。对于这本书的译移,我们自认为是负责的、尽心的、诚实的,但翻译中的错误恐怕还是不少。对于这些失误,我们希望读者不吝指正。

译者

这就是科学的本质：
提出一个大胆的问题，
你就踏上了通向
相关答案的道路。

(Jacob Bronowski 1973: 153)

没有理由对
我称为好的简约论有所怀疑^①。
好的简约论就是对不回避正题的科学的忠诚，
它一开始就不以神秘或奇迹蒙蔽世人。

(Daniel C. Dennet 1995: 82)

① 简约论(reductionism)受到科学界的怀疑。对于 reductionism (简约论), *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mon Blackburn: 1996: 322) 是这样解释的:“简约论者认为,只要有另外一些事实或实体的支持,表面上需要用来证明某些领域的论断为真的事实或实体是没有必要的。简约主义是对不同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一种解决途径。这样,你便可以主张将生物学简约到化学里去,如果你认定并无独特的生物学事实存在的话;也可将化学简约到物理学中去,如果你认为并无独特的化学事实存在的话。……”但是, Daniel C. Dennet 在此称的 good reductionism,即所谓“好的简约论”,是不该受到怀疑的。Verschuereen 提供的背景知识如下:好的简约论意味着,以这样的方式简约某一现象,即:既简约到有可能描写,又不过度简单化——过度简单化总是冒险的。“Good reductionism” simply means: reducing a phenomenon in such as way that it becomes possible to describe it (but without oversimplifying it—which is always the risk when “reducing”)——译者。

作者为中文版所写的序

耶夫·维索尔伦

安特卫普大学

《语用学诠释》[*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原文版]已于2000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获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再版发行。一个人的著作受此赏识,乃至受到如此关注与资金投入,深以为荣。所感所佩之殊荣,更因挚友钱冠连教授花时费力汉译全书而再增。此事绝非举手之易,若相托此事于他者,实非耶某所愿矣。有幸与钱君相识经年。倘余记忆无误,初遇乃是1989年之11月,恰逢广州中国首届语用学研讨盛会。俄而,钱君客座安大,为期九旬;三逢于济南,四会于长春,皆因中国语用学会之事。其间,他曾服务于国际语用学界,(因当时之经济状况^①)照管国际语用学会在华之资料分配中心。岁月如流,他不啻为卓尔同事,亦为诚友,虽驰书相问甚少,钱君亦一往宽容;偶尔互致信函,亦未做到更为精炼、紧细而有助益。

余多次访问中国,所遇之优秀学者甚多,钱君以外,尚有顾曰国、何自然、张绍杰诸君,恕不一一。屡次访华,深感中国学者多求西学,尤以吸收英美之语言学学术传统为甚。耶某强调再三,中国境外之语言学家,大有必要学研中国学术成果。流年如斯,鄙人之注意力业已引向中国学者具体贡献,一在古老学术传统,二在反观于中国语言与文化自身之语言观。正因耶某乐于研修更多之中国学问精华,亦因深悟己之所作对上述之事多现无知之弊,故而,对推介自己著作多

① 当时我国为美元不能自由汇兑国家,国际语用学会为了照顾我国学者能得到会刊,便在中国设立一个资料分配中心(广州外国语学院,即今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可以人民币得此资料之复印件。于是此处便有了耶氏之“as long as the economic situation permitted by”(因当时之经济状况)一说。——译者。

有迟疑踌躇。姑请容某努力奋进之。

语言使用研究之中,英美传统大一统之,而《语用学诠释》在某一方面似有突破。然这一传统之某些背景知识亦在此书的构建中予以接纳。即使无更多预备知识,此构建亦能顺利解读,因某些基本概念已于第一章作了系统介绍。此书虽满负实例(几乎全属“西方”案例,除语言人类学者提供几例之外),其宏旨大观仍在理论。拙著意在提供一普遍理论框架,以讨论语言之语用问题。在此,若在最一般的跨学科意义上,语用学应如是观之:它乃是对语言与语言使用之认知、社会与文化上之纵观。然观其果,恐仍不乏学子怀有大惑:“固然有趣,若逢研习一语言使用片段时,又如之奈何?”

运用此中理论概念,确需颇多之创造性甚或想象。请允许耶某在此给后学诸君些许提示。观察三至六章,此为理论主体,读者通读所列论题当不泥先后顺序。不妨如此:为分析某一语篇片段,首先尝试鉴别此语篇所呈现之活动类型(第5.2节)。此一鉴别将要求许多语境信息(第三章),并需与意识突显层面(第6.3节)及工具性语用意识(第6.4节)直接联系之。如此纵横联络一旦建立,则以下二者——系统详察不同结构层次(第四章)、联系语言使用者认知处理以描写诸结构层次所涉之意义生成动态性(见第五章)——遂有可能。最佳者,莫过于在下就此过程逐一示范;不幸者,如此示范工夫又需一本书之分量也。

当论及一具体语言问题而非总体分析一语篇片段时,运用本书理论框架之程序,取决于所搜语料之类型。然,开出一个十拿九稳之指导良方,又断乎不可能也。

愿读者诸君能从此书引出一二有所裨益之启示。在下之所诚信者,乃读者能用拙著促进科学知识之拓展。在涉及许多应用领域——诸如语言教学、翻译、电脑交际系统、跨文化与跨国度交际、语言疾病等方面时,有助拓展科学知识,毕竟为主要之目的矣。

于安特卫普

2002,01,31

附件：耶夫·维索尔伦所写之中文版序言原件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PREFACE TO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Jef Verschueren

University of Antwerp

In 2000,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was already re-published by th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for distribution in the mainland terri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is a great honor to feel that one's work is appreciated enough to warrant such interest and effort. The feeling of being honored is augmented all the more by the time and energy it must have taken for my dear friend Professor Qian Guanlian to undertake a full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into Chinese. This cannot have been an easy task, which—therefore—I would not have liked to entrust to anybody else. I have the pleasure of having known Professor Qian Guanlian for many years. If my memory serves me well, I met him for the first time in November 1989, on the occasion of the first Chinese Pragmatics Symposium in Guangzhou. Later he was my guest at the University of Antwerp for a three-month period, and I met him again at Chinese pragmatics conferences in Jinan and Changchun. Meanwhile he served the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community as long as the economic situation permitted by taking care of a distribution cent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 in China. Through all those years he has not only been an excellent colleague, but above all a loyal friend, forever patient

with the sporadic correspondence which could have been much more intensive, elaborate, and supportive.

On my visits to China I met many excellent scholars in addition to Professor Qian Guanlian. To name just a few: Gu Yueguo, He Ziran, Zhang Shaojie, and many more. During my visits to China, I always had the feeling that Chinese scholars were trying to learn too much from the 'West', in particular from Anglo-American traditions of linguistic scholarship. I always repeated that there was a great need for linguists outside of China to learn more about what Chinese scholarship could produce. Over the years, my attention has been drawn to specific Chinese contributions, drawing partly on ancient traditions of scholarship, but also on a view of language that is reflexively represented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itself. It is because I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about these insights, and because I know my own work displays ignorance of them, that I can only hesitatingly recommend my own book. But let me try anyway.

In a way,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breaks with a dominant Anglo-American tradition in the study of aspects of language use. Some background knowledge of this tradition is assumed by the way in which the book is structured. Yet, even without too much prior knowledge it can be interpreted well, especially since some of the basic concepts are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d in chapter 1. Though the book is full of examples (almost all 'western' I'm afraid, except for a few examples provided by linguistic anthropologists), its ambitions are predominantly theoretical. The intention is to provide a gener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discussion of pragmatic aspects of language—where 'pragmatics' is viewed in its most general interdisciplinary sense as a cognitive, soci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on language and language use. The result is, however,

that some students may be left with a crucial question: "This is all very interesting, but what can I DO with it when studying a piece of language use"

Applying the theoretical notions, indeed, requires a good deal of creativity and even fantasy. Let me just give the student a few hints. Looking at chapters 3 through 6, which form the body of the theor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one should not go through the topics mentioned there in a linear fashion. Rather, in order to analyze a piece of discourse, first try to identify the activity type it represents (section 5. 2.). This identification will require a lot of contextual information (chapter 3) and will have direct connections with levels of salience (section 6. 3.) and metapragmatic awareness (section 6. 4.). Once these interconnections have been established tentatively, it becomes possible to systematically go through different levels of structure (chapter 4) and to describe the meaning-generating dynamics they involve (back to chapter 5) in relation to the language users' cognitive processing (back to chapter 6). Ideally, I should be able to give a full-scale example of this procedure. Unfortunately, that would take another book-length presentation.

When addressing a specific linguistic problem rather than the general analysis of a piece of discourse, procedures for apply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will depend on the types of data collected. It is not possible to set forth a sufficiently solid singular guideline.

I hope the readers of this book will be able to derive some beneficial insights from it. I am convinced that many of them will be able to use it in such a way as to contribute to the expans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hat, after all, is the main goal in an area with so many fields of application such as language teaching,

translation, computer communication systems, intercultural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language disorders, and the like.

Antwerp

January 31, 2002